

《双城记》的伦理身份与暴力冲突

罗 朗, 李 炜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2年7月5日; 录用日期: 2022年9月5日; 发布日期: 2022年9月15日

摘 要

《双城记》以细腻的手法勾勒出法国大革命的真实场景, 书中人物的伦理身份加剧了社会的暴力冲突。通过人物身份的突转, 狄更斯描述了暴力冲突的基本形态和伦理价值的危机, 借助卡尔顿的语言, 阐述了他对法国大革命中权力滥用的理解与认识。

关键词

《双城记》, 法国大革命, 暴力冲突, 伦理身份

Charles Dickens' Philosophy of Violence in the Ethical Knots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Lang Luo, Wei L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ul. 5th, 2022; accepted: Sep. 5th, 2022; published: Sep. 15th, 2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trace back the real scenes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to show the complicated ethical knot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nd their violent conflicts. With the abrupt turning fates of the characters, Charles Dickens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basic types of violent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moral values. With the final uttering words of Darnay, he expresses his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n the abuses of powers happene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Keywords

A Tale of Two Cities, French Revolution, Philosophy of Violence, Ethical Knots



1. 引言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 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法国的命运, 也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命运,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思想与政治。从那以后, 革命的观念超越了法国, 波及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匈帝国、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等君主制国家, 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历史进程。如果从思想观念上讲, 从柏克撰写的《法国革命论》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欧洲知识分子不断反思这场革命的价值和意义, 争论的声音一直持续至今。伯克写道, “法兰西的新鲜的废墟只要我们放眼望去, 就会震撼我们的感情, 它们决不是内战的蹂躏; 它们乃是深远的和平时期的粗暴无知的谋划之可悲的但却富有教育意义的一个纪念碑” [1]。托克维尔却说, “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 尽管它有各种错误, 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 [2]。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赞扬的声音与指责的声音同时存在, 伯克与托克维尔的立场和观点截然相反, 他们代表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分裂。

埃德蒙·伯克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 博学善辩, 主张政治清明, 反对政治压迫, 坚持光荣革命的原则, 《法国革命论》写于法国大革命爆发次年, 是研究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托克维尔出身法国贵族, 倾向自由主义, 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 在欧洲和美国都极为畅销, 是研究大革命的必读著作。但是两位著名学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面前, 立场观点迥异, 评价也是天壤之别, 使我们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也充满疑惑。

对于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双城记》也引发中国读者的极大兴趣, 由于小说对大革命的场景描写逼真, 气氛紧张, 能够把读者带回当时的现场, 身临其境, 非常生动。这是柏克和托克维尔等哲学家无法做到的, 政治思想家只分析原委, 并不还原事件场景。若想了解大革命的真实气氛, 还需回溯到狄更斯的《双城记》。狄更斯在书中很少探讨政治理论和原因, 他专注于叙述, 专注于故事的写作。但是在故事里, 还是能够感受到狄更斯的一些强烈的感情基础和态度, 他的小说更多是从伦理角度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

国内学者探讨这部小说, 大多停留在简单的道德批评, 深入研究的文章较少。《双城记》包含了比较完整的伦理意识和伦理结构, 仔细阅读小说就会发现前两个部分的叙述, 就是在编织一个伦理结构, 特别是小说第二部分的标题: 金丝网(the Golden Thread)。所谓金丝网, 实际上就是一条伦理线的发展过程, 其中有三条线索的发展缓慢而痛苦地交织在一起: 1) 侯爵和侄子的关系; 2) 曼内特医生在伦敦的生活; 3) 德伐日夫妇在巴黎的活动。三方人物分散在不同地方, 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 却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慢慢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难以解开的伦理结。

2. 纠缠的伦理结构

小说情节是从 1757 年开始, 法国大革命爆发是 1789 年, 扣人心弦的高潮部分发生在 1793~1794 年的法国。时间跨度很长, 从 1757 年到 1794 年, 长达 37 年时间, 而 37 年的叙述都是为 1794 年的情节做铺垫。

小说前两部分叙述试图勾勒出全景式的法国社会。当时的法国宫廷业已脱离实际的社会管理, 整日沉湎于化妆舞会和上流社会的各项娱乐。贵族和官员互相勾结, 滥用权力, 他们的管理就是镇压, 让狗听从鞭子的命令。下层民众既无权利也无地位, 只能麻木地服从。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3]。卢梭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呼声，贵族制度已经成为旧时代的枷锁，人们公开谈论自由和平等。侯爵的侄子达尔内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切，1780年跟叔父的最后一次会面，两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侄子说：“把我跟一个我认为可怕的制度绑在一起，要我对它负责，而我却对它无能为力。”叔父说：“我宁可为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制度的永存而死” [4]。开明贵族显然已经意识到法国的种种罪恶与危机，而保守派贵族却誓死捍卫旧制度的种种特权。他们虽然同是贵族，同为骨肉，但是思想感情却截然不同。贵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开明贵族想要改变社会现状，保守派贵族极力维持现状，两者有尖锐冲突，可是他们又骨肉相连，因此伦理的危机凸现。

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情况开始变化；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种迄未注意到的内在震动” [5]。这是大革命爆发之前的法国，整个社会结构业已涣散，经济危机导致饥荒，冲突矛盾加剧，统治只有依靠镇压和监禁维持。事件的爆发都有长期积累的效应，法国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双城记》选择从1757年开始讲述，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来讲述这段历史是有深意的。侯爵兄弟的罪行，发生在革命爆发很久以前：兄弟俩奸杀农妇、监禁医生是在1757年，距离革命爆发尚有32年；曼内特医生获释是1775年，距离革命爆发还有14年；侯爵在别墅中遇刺身亡是1780年，距离革命爆发还有9年。罪恶的侯爵兄弟去世多年，曼内特医生也获释14年，这桩冤案与大革命的爆发并无直接联系。那么，狄更斯花费这么多的笔墨去描述一起距离革命发生很久以前的冤案，有什么意义呢？侯爵兄弟亦非宫廷中的重臣，况且兄弟俩在革命之前已经去世多年，狄更斯为什么还要强调这段过往已久的案件呢？

狄更斯在故事开头埋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叙述一段过往的仇恨，是为了在革命爆发之日考察每个人的思想和动机。小说可能暗藏更加深刻的主题：是否因为上一代人所犯下的罪恶，就必须在下一代人中去清算？什么才是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的标准？伦理与暴力冲突时，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抚慰不幸的灵魂？作家通过小说前两个部分的叙述，使三个方向的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共同面对暴力的考验。

3. 纠结的伦理身份

查尔斯·达尔内是圣·埃佛瑞蒙德侯爵的儿子，这是一个爵位很高的贵族，仅次于公爵的地位，可以世袭。可是他对父亲和叔父制造的各种罪行衷心忏悔，他接受了启蒙主义思想，认为贵族不应该把强权建立在暴政、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他认识到贵族统治带来的种种罪恶，下决心彻底决裂，他放弃了爵位继承权，放弃了法国的所有财产，来到英国成为一名法语教师。他不仅懂得劳动，也富有同情心，获知老仆人因为他的牵连被投入巴黎监狱时，决心冒险前往解救。此时他与露西已经成婚，生下了一个女儿，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正义感和责任心驱使他前往巴黎，开始了最紧张的第三部分。对于查尔斯·达尔内这个带有历史问题而又无辜的人，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他？放过他还是清算他？这个富有争议的人，给他的朋友、亲人、仆人与敌人，都带来了生死攸关的考验。

德伐日夫妇是巴黎革命群众的代表，代表着法国被压迫、被欺压的人民群众，反抗意识最强烈。德伐日酒馆在革命爆发前是革命者串联的地方，革命爆发后是圣安托万起义的中心。

革命的爆发并非故事的尾声，乃是真正故事的开始。天真的达尔内回到巴黎就被冠以“外逃分子埃佛瑞蒙德”，达尔内惊叫起来：“凭什么关我，我并没有犯什么罪？”达尔内辩解说，他是为了搭救一个朋友而来，他只想消除一些误解，朋友的信件就是证明材料。军官麻木地回答：“外逃分子是没有权利可言的，埃佛瑞蒙德” [6]。军官屡次强调他的贵族名字是意味深长的，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外逃分子”也是意味深长的。这种有罪推论的逻辑被广泛地运用到一切可疑人的身上，没有申辩，没有权利，所有

贵族不论是否有罪都要接受惩罚, 达尔内应该从军官的态度中感觉到不妙。

德伐日夫妇的态度也耐人寻味。他们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表现得英勇无畏、大义凛然, 但是当他们得知达尔内的真实身份以后, 德伐日太太的态度阴森可怕。达尔内的出现燃起了她复仇的火焰, 她正是侯爵兄弟害死的那位年轻少妇的妹妹, 虽然侯爵兄弟死去多年, 这笔账决不能因为他们的去世而一笔勾销。即使无法清算仇家, 也要清算他的儿子、亲戚和一切相关的人身上。

德伐日夫妇的态度与曼内特医生形成鲜明对比。曼内特医生也是旧制度的受难者, 在巴士底狱关押了 18 年, 妻离子散。长期的监禁使他患上了监狱幽闭症, 导致心理休克, 形成一种奇特的心理自闭和交际障碍。罗瑞和露西把他接到英国后, 经过长期的休养才恢复。当他得知达尔内——他的女婿——竟然是侯爵的儿子! 这个昔日仇敌的儿子竟然迎娶他唯一的女儿! 此时的医生禁不住刺激旧病复发, 再度陷入心理休克长达九天九夜。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冲突! 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搏斗, 一方面是对侯爵兄弟的痛恨, 另一方面他又明白达尔内的无辜。医生最终原谅了达尔内, 同意了他的求婚, 他知道这些冤屈与血泪不能清算到年轻人的头上。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原谅敌人的儿子; 更伟大的是, 他将再度赶赴巴黎, 冒着血雨腥风拯救达尔内的性命。医生并未将自己的痛苦施加于他人, 他承受痛苦原谅他人。医生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因受难而获得同情, 因慈悲和宽容赢得尊敬。

可是, 这种光辉人格差点因德伐日太太的复仇而成为悲剧。德伐日太太不动声色地整理着她的“惩罚名单”, 所有伤害过她、得罪过她的人都被列入名单。很快, 这张“惩罚名单”就变成了“死亡名单”。她眼见医生营救达尔内取得胜利, 心里非常不快, 暗中搜罗证据, 欲将达尔内和医生、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一起送上断头台。她的阴谋连丈夫都觉得过分了: “好了, 好了”, 德伐日说, “总得到一个地方为止吧!” “到斩草除根为止。”德伐日先生颇感为难, “大体说来我并不反对, 但是这位医生受了太多的苦, 他今天的情况你是看见的, 宣读手稿的时候你也观察过他的脸。”老板娘生起气来, “我观察出他那张脸不是共和国的真正朋友的脸” [7]。德伐日和雅克三号都从她那震怒的语调里, 感到了巨大的恐怖。他们明白, 想要阻止这个女人的复仇, 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虽然违背良知, 他们却无力抗拒这个女人复仇的意志和决心。这个女人的仇恨如此深刻, 复仇的意志如此坚定, 以至于连无辜者的鲜血也一并索取。

故事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纠缠的伦理问题, 达尔内是医生仇人的儿子, 却变成他的女婿; 医生曾是德伐日的主人, 现在却成为对手; 露西与德伐日夫人本是亲密朋友, 现在却成为死敌。因为达尔内的身份问题, 所有的伦理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扭曲, 人性的善恶也出现了极度转化。

4. 法庭的伦理死结

译者孙法理先生在“译后记”中曾说: “《双城记》中最有悲剧意味的人恐怕就是泰雷兹·德伐日(太太)了。她的悲剧性不在于她极其悲惨的家史, 而在于她最终失去了读者的同情” [8]。为了发泄私愤, 硬要坚持“斩草除根”理论, 不但要把达尔内送上断头台, 还要索取医生、医生的女儿、以及小孩的生命来报家仇。为此目的, 她要求雅克三号去陪审团秘密串联, 逼迫补路工出庭作假证。她那监视一切的眼睛, 咄咄逼人的气势, 不仅失去了读者的同情, 还让读者觉得万分可怕。德伐日太太阴沉而冷酷地编织冤案, 这一次远不止监禁, 而是断头台; 不仅侯爵儿子, 还有医生一家人。她已控制了一个锯木工, “德伐日太太已经跟他排练过了, ……捏造的罪名不难估计, 很平常: 搞监狱阴谋” [9]。法庭的陪审席上, 坐着德伐日夫妇和雅克三号, 他们的革命意识很狭隘, 就是复仇; 他们的革命目标也很狭隘, 一切他们不满意、不高兴的人都要铲除。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 狭隘的人为意志就可决定别人的生死。革命最初的目标是推翻君主制和贵族统治, 到了后来连普通人的命运都难以预料: “五十三个, 一个一个点了名, 从七十岁的赋税承包商到二十岁的女裁缝。前者的全部财富买不回他的命, 后者的贫穷与低贱也救不了她的命” [10]。冷酷的暴力到处弥漫, 摧毁一切伦理和道德底线。连曼内特医生这位“巴黎城没有人的名

气比他更高的人”都难以自保，还有谁会安全呢？

审判程序被简化了，陪审团已不再存在，法官代行陪审团的职责，判决后不得上诉。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没有谁会因为出身贵贱就能置身事外，安享太平！就连雅克三号也要小心翼翼地讨好德伐日太太，补路工和锯木工都因害怕她而作伪证，捏造罪名，以求自保。1789年7月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到1793年演变成血雨腥风的“恐怖统治”，这完全让人们感到震惊和意外。德伐日夫妇后期的活动也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冷酷、自私、专横，人性和同情心在他们身上已经泯灭。事物又回到相似的原点：侯爵的残酷就是德伐日夫妇的残酷，德伐日夫妇的冷酷又何尝不是侯爵般的冷酷。

狄更斯的小说描写了两种暴力的泛滥：一种是旧制度下法国贵族专横的暴力；另一种是雅各宾专政的暴力。两种暴力都有相同的特点：简单粗暴。两种暴力形式还有一个特点：对宽容和公正的打击。医生由于天性善良、正直、公正和宽容，在旧制度下遭受监禁、饱受折磨，在大革命后也险遭不测。达尔内也具有相同的天性，在旧制度下不能生活，在大革命中亦不能自保。这就是狄更斯的暴力哲学：善良正直的人在两种暴力面前都可能招致毁灭，能够生存下来的是像“雅克三号”那样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卑躬屈膝的人。

如果这样的话，狄更斯就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了，他的小说人物也就无路可逃了。如何才能拯救医生、露西和达尔内的命运呢？如何才能保持人性中的善良、正直、宽容和公正免遭毁灭呢？

5. 断头台上的救赎

残酷的现实面前，只有依靠罗瑞先生的正直可靠、曼内特医生的忍耐和宽恕、露西的爱、普格丝小姐和克朗彻的忠诚才能度过难关。即使是对德伐日太太这样阴险冷酷的女人，狄更斯同样能从宽容的角度来理解她。达尔内要为他父辈的罪孽而死，这在德伐日太太看来理所当然，因为她看见的不是达尔内而是他的父辈。跟她作对的人，是没有生活下去的权利的，谅解办不到，怜悯之心更不会有。她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如此。若是在战斗中倒下她不会怜惜自己，若是被送上断头台她也只会咬牙切齿。但是，狄更斯能够理解“粗布袍子下面的这样一颗心”，这是一种极端的心理，极端的仇恨早已毁灭了她的柔情，因为她的仇恨太深，悲剧太深，双眼燃起的怒火，只有淋漓的鲜血才能浇灭。狄更斯能够理解这个女人，世间还有什么仇恨不可化解呢？狄更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世人，我们应该摒弃狭隘的爱恨情仇，理解和宽容每一个人。可是这样的伦理死结如何打开呢？他借助西德尼·卡尔顿这个人物，打开所有的伦理死结。

卡尔顿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的表演直到小说的结尾部分才展开，却寄托了狄更斯的理想与激情。许多文章注意到达尔内、卡尔顿与露西的三角恋关系，但是忽略了卡尔顿的救赎。卡尔顿的救赎不止是拯救了达尔内一人的性命，更是拯救了医生一家人，从卡尔顿最后一刻的表现来看，他的救赎是何其深沉而宽广！他的救赎具有耶稣基督般的救难意识。

《双城记》最感人的场景出现在卡尔顿的身上。描写最精彩之处不是卡尔顿和达尔内的掉包计，也不是他为了露西而舍生赴死。真正描写精彩之处，是卡尔顿走上断头台之际，对同样遭受不幸的小女裁缝的那种呵护之情^[11]。之前的小女裁缝只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卡尔顿对她的安慰与陪护显得深沉而宽广：

卡尔顿说，“让你的眼睛总看着我，亲爱的孩子，别的什么都不要想。”……她吻吻他的嘴唇，他也吻吻她的嘴唇，两人彼此郑重地祝福^[12]。

一个面对死亡的人，临死之际还不忘关心和安慰他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临死之际还能够给予别人安慰和平静的人，又需要具有多少的人格力量呢？卡尔顿不是故事主角，前面章节出现很少，但是当医生家人性命攸关时，卡尔顿出现了，以异常冷静的安排解救了全家。特别是当他在断头台上安慰小女裁缝的时候，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更显露出一种神性的光辉。卡尔顿以救难的意识走上断头台，他

的义举已超越了一般的牺牲精神, 达到了宗教宽容的境界。卡尔顿临刑的心态非常从容, 他的形象庄重而神圣, 带着宽容和慈悲的力量。由于这样的描述, 仿佛卡尔顿不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 他带着俯察人世一切的力量。

狄更斯更赋予了他一种神性的力量, 发出了先知的预言: “我看见巴萨、克莱、德伐日、复仇女神、陪审员、法官, 一长串新的压迫者从被这个惩罚工具所摧毁的老压迫者们的身上升起, 又在这个惩罚工具还没有停止使用前被消灭” [13]。难道这里提到的巴萨、德伐日等人, 不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吗? 这些雅各宾派的领袖在把别人送上断头台后, 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别人送上了断头台。大革命的洪流不仅冲垮了旧制度, 也把革命者们给淹没了。暴力一旦脱离了制度的规范和权力的限制, 最终的代价是所有的人一起毁灭。

“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 我看见这一时代的邪恶和前一时代的邪恶逐渐赎去自己的罪孽, 并逐渐消失” [13]。狄更斯借用卡尔顿的声音, 发出了最乐观的预测: 旧制度的腐朽和大革命的风暴终将过去, 人性的力量会慢慢复苏。这就是本文提到的狄更斯的哲学: 不论现实如何残酷, “人性的柔情”就像发芽的种子, 总要在荒凉的大地上盛开。这些人性的柔情, 具体来说就是善良与公正、宽容与安慰、呵护与陪伴、忍耐与等待, 才是帮助人们度过难关的根本力量。这些人性柔情不仅充满光辉的力量, 还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能够化险为夷。

6. 结语

《双城记》描述了革命前法国贵族的残暴统治, 也描述了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 是对当时社会的忠实反映。前后两个时代都是不幸的, 不幸的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两个时代互为因果, 两个时代都反映出权力滥用所带来的苦难, 暴力的泛滥使人人自危。如何防止权力落入邪恶者手中, 这成为后人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如果陷入这样的苦难之中, 狄更斯相信总会有一种自然而无形的力量拯救人的命运。卡尔顿就相信这样的力量, 因此带着坦然乐观的态度走向断头台。《双城记》的故事虽然悲惨, 却弥漫着一种坦然自信的力量。风暴总会过去, 平静总会降临; 残暴总是一时, 人性总会复归, 这就是狄更斯的信念。在大革命后期, 丹东的眼睛不是“曾为几个不幸的人湿润过”吗? 罗伯斯庇尔在斩断了丹东的头颅之后, 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沉默不语, 他的内心不也遭受了良心的拷问吗? 狄更斯认为, 暴力摧毁一切, 无可阻挡, 但凶暴的力量总是难以持续, 宽容与公正才是永恒之物。他透过卡尔顿之眼, 看见了未来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 达尔内一家平静而安详的生活。他通过自己的牺牲和殉难, 获得永恒不朽。因此, 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狄更斯更相信安慰的力量。《双城记》是一本具有安慰力量的小说, 它因为宽容而有自信, 因为自信而有安慰。这种安慰的力量也是文学的基本力量, 文学并不止于讲述, 更有一种抚慰精神的力量。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金的[项目批号: SWU1209350]的资助。

参考文献

- [1] 埃德蒙·伯克. 法国革命论[M]. 何兆武, 许振洲, 彭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1.
- [2]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2.
- [3] 雅克·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4.
- [4]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117-119.
- [5]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10.
- [6]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242.

-
- [7]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24-325.
- [8]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69.
- [9]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29.
- [10]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31.
- [11] Schor, Hilary. (2001) *Novels of the 1850s: Hard Times, Little Dorrit, and A Tale of Two Cities*. In: Jordan, J.O.,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4 p.
<https://doi.org/10.1017/CCOL0521660165.006>
- [12]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57-358.
- [13] 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359.